

去宋代感受茶的极致美学

——读日月洲校注《大观茶论》

■唐骋华

日月洲先生汇集了八册宋人茶书,认真考订,耐心注释,汇成了厚厚的一部《大观茶论》。这书名,就取自其中一册,作者是大名鼎鼎的“文艺皇帝”——宋徽宗赵佶。

以赵佶的小册子为整本著作命名,原因之一,当然是他在八位作者中地位最隆。但赵佶凭借的,绝非压倒性的权势,而是因为他对于茶确有极为精深的研究,并自成体系,达到了宋代乃至中国古代茶文化的巅峰。

说到茶文化,今人往往追溯到陆羽那儿。陆羽活跃于唐代中叶,其编纂的《茶经》是世界上第一部茶书。《茶经》首先开河,梳理了茶叶的生产与源流、饮茶的门道和技艺,陆羽也因此被誉为“茶圣”。如今市面上有各种版本的《茶经》,可谓流行度最高的茶书。

然而有一个问题被忽略了,那就是陆羽的境遇。自开元二十五年(公元737年)张九龄罢相,唐代再也没有寒士能做到宰相,政权高层重新被世家大族垄断。而陆羽呢,是个弃婴,连自己的身世都不知道,终其一生游走民间。考察陆羽的交游网,最尊贵的人物也不过是皎然、皇甫冉等。诗僧皎然,俗姓谢,为南北朝大诗人谢灵运十世孙,算是名门之后。但皎然终生隐居,论诗风,在唐代又属于支流,并不为当世所重。至于皇甫冉,只做过拾遗、补阙之类的低品级小官,同样无法跻身上流社会。

这样的交际圈限定了陆羽的认知和视野。以常理推断,他记录的茶艺多在民间流行,与士大夫的饮茶风尚有所隔膜。诚如日月洲先生指出的,陆羽那一套,唐宋年间

称作“草茶”。草,可理解为草根,就是说《茶经》集民间茶文化之大成,但距离文人雅士的段位,还差点意思。要知道,在宋代,民间跟士大夫的审美差异,可不止一点点。

宋朝虽然积贫积弱,却创造了丰富的文化。宋诗宋词不说了,举凡字画、书籍、雕塑、瓷器、家具,审美水准之高,令后世膜拜。而将审美推向极致的,正是士大夫阶层。两宋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优待士大夫的朝代,宋代士大夫拥有诸多特权,不仅衣食无忧,且有大把时间。这种政策,对政治、经济、军事都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,但客观上促进了文化事业,具体来说,就是文化的深度化与雅致化。

美国学者凡勃仑在《有闲阶级论》里论证说,在传统社会,忙于劳作的人是没精力也没能力进行文化创造的。从印度到波利尼西亚,文化创造皆出自有地位、有闲暇、全脱产的上层社会,即所谓的“有闲阶级”。在宋代,士大夫阶层就构成了中国版的有闲阶级,他们手握庞大的社会资源,为己所用,又借助发达的商品经济取得大量财富。依靠时间和金钱的持续积累,士大夫发展出了极为深厚的文化传统。

到宋徽宗时代,宋代文化登峰造极。这一方面拜外部环境所赐。1005年初,宋辽签订《澶渊之盟》,以宋廷向辽国交纳巨额岁币为代价,换取了和平。此后,宋朝和西夏之间虽互有攻伐,但局限于西北,不至于伤筋动骨。待赵佶于1100年登基,北宋承平近百年,士大夫养尊处优惯了,重玄谈,轻实



《大观茶论》
(宋)赵佶等著
日月洲注
九州出版社出版

用,致使武备松弛而文治昌盛。

另一方面,赵佶原本也不是被当作储君来培养的。他自幼爱好舞文弄墨,骑马蹴鞠,虽为帝胄之后,趣味却和士大夫一致。抛开皇族身份,他实际上是一位标准士大夫。相比之下,赵佶在政治方面的训练就十分匮乏了。他能登上帝位,是北宋后宫势力、官僚集团多方博弈的结果,不是没有争议的。即位前就有大臣认为赵佶举止轻佻,像个艺术家,而无人君之相。

事实也确实如此。赵佶在位期间,文化艺术大飞跃,政局却一天比一天混乱。最终,金人南下,北宋覆灭,赵佶沦为亡国之君。元朝丞相脱脱在编纂《宋史》时曾搁笔长叹:“宋徽宗诸事皆能,独不能为君耳!”

诸事,指的大约是琴棋书画之类。在这些领域,赵佶有着极高

的造诣。他独创的“瘦金体”,为书法史经典;他设立翰林图画院,把全国最优秀的丹青妙手汇聚起来,精益求精,佳作源源不绝;他对蹴鞠等游艺活动的热爱,更因后世话本小说的渲染而广为人知。或许是在这几个领域都表现得太过惹眼了,反而遮掩了赵佶对茶的精到认知。

其实,赵佶嗜茶,当时已经是公开的秘密。他广泛搜集材料,辨识茶的来源与种类,了解制茶工艺,并对如何品茶进行了深入探讨。登基后仅七年,赵佶就写出了《大观茶论》。“大观”二字出自该年年号,有“规模宏大、内容齐备”之意,恰好映衬出赵佶的雄心——为茶作书立传,将茶提升到一个新高度。

前面说过,《茶经》推崇的茶,在士大夫眼里不过是“草茶”。囿于被等级社会决定了的交际圈,陆羽无法进入士大夫生活的内部,因此《茶经》还不够风雅,不能完全满足士大夫日益深化的美学需求。赵佶不同。他是帝王,地位比士大夫还高,他品的茶,无论产地抑或工艺,普通人远远及不上。这造就了非凡的品位。简言之,就是“贵族范”。

翻开《大观茶论》,“贵族范”扑面而来。何为“贵族范”?本书导言中,日月洲先生做了个有趣的对比。唐宋时期人们喝茶,不像如今这样用开水泡,而是用水煮,煮出来的茶,味道肯定苦涩些。为了减少苦味,陆羽提议加盐,但盐能去苦,却会破坏茶香。那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呢?有的,不过成本极高。宋人的办法是,采集最优质

的茶芽,经过多道工序,千锤百炼,去掉苦涩物质。这即是《大观茶论》描述的“蒸压法”——先蒸青,再压榨,而且要反复压榨。有人可能要问了:这么折腾,茶叶中的营养物质岂不是流失殆尽了?的确是,可贵族不在乎,他们追求的是口感,其他方面根本不考虑。

上有所好,下必甚焉。赵佶不厌其精的要求,直接导致了御茶的升级换代。龙团凤饼产自福建北苑,从宋太宗起进贡宫廷,在欧阳修生活的时代,龙团凤饼的价格就已经很高,每斤值二两黄金。赵佶当政后,制作工艺越来越精,按《大观茶论》的标准,不惜达到“碎玉锵金、啜英咀华”的程度。相应的,龙团凤饼的价格连年攀升,至北宋末年,连高官显贵都难求一两了。

这还只是冰山一角。赵佶对白茶的推崇、对汝窑的偏爱,都树立了典范。在他手上,茶超越于日常饮用之上,成了美学和精神上的极致追求。这对后世的影响力是难以估量的。尽管赵佶为这种追求抛弃了作为一国之君的职责,弄得国力耗尽、民怨沸腾,因而不足为训;但从茶文化史、美学史的角度,《大观茶论》自有其参考价值。

然而这毕竟是将近一千年前的著作,加之宋代制茶技艺失传已久,想读懂它,并不是容易的事。所幸文化学者日月洲仔细考订、注释,还写了两篇长长的导言,降低了阅读门槛。同时,日月洲将另外七部宋代茶书也收了进来,既有作于赵佶《大观茶论》之前的《茶录》,又有作于其后的《宣和北苑贡茶录》,为我们全面把握宋代茶文化,提供了成体系的素材。

成长的复杂与人性的丰盈

——评田耳长篇小说《下落不明》

■刘小波

刊发于《花城》2018年第一期的田耳新作《下落不明》近期即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,小说讲述了一群文艺青年对理想的坚守以及最后理想破灭的故事,具有一种独特的孤独气质与自传性质。田耳的身份标签很多,青年作家、少数民族裔、大学教授、孤独写作者等,他的创作题材也十分宽泛,甚至在一部作品中也是小径不断岔岔。《下落不明》就是如此。故事的外衣是一桩凶杀案,但中间穿插了家族叙事、文学青年的成长、青春的回忆、理想的坚守与破灭、形式各异的情爱故事等,既有刑侦悬疑的通俗性,也有理想信仰的灵魂探析,既有个体另类的成长史,也有一代人共通记忆的追寻。

《下落不明》描写芸芸众生,各色人物相继出场,笔墨不均情感却无差别。田耳对成长与理想的讨论首先从人物的生存环境开始,耿多义、耿多好、齐虎、失足小姐、被人包养的女性等,都如蝼蚁般苟活于世。小说特别塑造了具有病态气息的作

家耿多义这一形象,通过其独特的创作模式与生存方式来书写青年的成长。田耳的创作有一种代入感,即进入他人的痛苦中去,与人物共呼吸,使得他的小说读起来有一种切肤之痛,这种痛苦扑面而来,毫无隔应感。《下落不明》表现得尤为明显,有一种自传性质,同时,小说还回归文学与作家本身,具有元小说的意味。

田耳自嘲《下落不明》是一部关于成长的小说。小说中有大量的人物不断出场,有些贯穿始终,有些昙花一现,但几乎每个人物都面临成长的尴尬,在成长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受到阻力,这种阻力来自多方面,既有家庭的因素,也有大的时代背景。比如耿多义成长期间受到同胞哥哥的欺压,甚至被打傻了脑袋;莫小陌的家庭分裂,父亲与自己的闺蜜纠缠不清,她本人的成长则受到母亲明总的干涉,连自己对文学的爱好也被控制,被硬逼着写武侠小说;欧繁则出身于重男轻女的家庭,因超

生的原因东躲西藏。总之,这些人物后来的不幸或悲剧与这些尴尬的成长环境并无关系。当下有很多小说以成长为主题,而且内容大多是负面的、尴尬的,进而影响个体的一生,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。

成长小说似乎大都是“青春祭”,《下落不明》虽然也有大量的童年与青春记忆,但是并不落俗,而是通过回忆为成长做铺垫,为理想唱挽歌,通过成长的复杂写出人性的丰盈。成长通常意味着理想的消亡,但小说还是留下了诸多光明的尾巴:耿多义仍在坚持写作,欧繁与老莫相依为命,耿多好改邪归正,过上了正常安定的生活,只是耿多义苦苦追寻的莫小陌仍旧下落不明,这似乎是理想失落之隐喻。

文学评论家谢有顺指出:“田耳的伦理观,有齐物之想,无善恶之差别,以平等心、同情心、好玩之心,批判一切,也饶恕一切,正是这样的创作伦理,使得其作品无明显善恶对立,而是在善与恶的纠缠中展现

生存的艰辛与艰辛中的温暖。”田耳的平等思想和齐物伦理观使得他的作品中善恶并不截然对立,而是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丰盈性。他钟情刑侦与犯罪一类的通俗题材,借助善与恶的暧昧性来深掘人性。他似乎秉持一种审丑美学,对人性的恶进行深入挖掘,这种恶说到底与人性有关而非与阶层有关。田耳解构了阶层的划分,以平等之心对待每一位个体,书写了每一个人的生存困境,如何应对生存、世界、自我,如何成长,是每个人都需要思索的问题。

田耳的《下落不明》有一种去价值判断、去阶层划分的意味,可谓自我和解与原谅之作,原谅一切,最终原谅自我。芸芸众生的生存空间、奋斗打拼、情爱婚恋、精神面貌等,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精彩的呈现,是文学拉近与现实的距离,深度介入生活的最好例证。也正是通过这些描摹,作者书写了人性的复杂与丰盈,为众生带去些许的慰藉。